

苏区革命的传播和赣闽纸业的兴衰

黎志辉, 余淑兰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近代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席卷了南方省份的大部分产纸区域。革命运动与近代纸业的历史关联,以处于革命漩涡中心的赣闽两省为例,可从以下方面予以阐释:一是两者在地域上的高度重合,虽不可避免地对纸业工人参与革命运动产生刺激或诱导作用,但总体上这种革命参与现象并不普遍;二是注重宣传的中共组织对纸的大量需求,不但促使革命区域的纸业生产在战争状态下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且突出地反映了中共以革命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特质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近代纸业; 苏区革命; 革命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6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3-0073-07

The Spreading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aper Industry in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LI Zhihui, YU Shul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Sovie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had involved most of paper production areas in Southern provinces. Taking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in the revolutionary center as an example, we can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the modern paper industry as follows: on one hand, they were highly coincident geographically,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ad a stimulating or inducing effect on paper industry workers, which is totally inevitable.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as not comm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which paid attention to publicity, had large demand for paper, which not only urged the paper production in revolution areas to restore in certain degree under the state of war, but also reflected prominently the political mode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trait i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preading.

Key words: modern paper industry; Soviet revolution; spreading of revolution

中国手工制纸起源于湖南,南方五省——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和四川为其主要产区,此外安徽、广东、广西、贵州产量亦多。^[1]由于制纸需从山区采伐竹木等主要原料,又需用洁净的水制造纸浆,因而各

收稿日期: 2014-04-22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区社会的革命传播和国家形成”(编号: 10SH51);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号: 13XDJ008)

作者简介: 黎志辉(1976-),男,江西抚州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苏区史。

省重要的产纸区域大多位于靠近河流上游的僻远山区,这类区域通常是省际或县际交界的地区,也是政府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

1927年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从城市向乡村的传播过程中,席卷了南方大部分产纸区域。中央苏区的两大核心区域——赣南、闽西,即囊括瑞金、石城、长汀、上杭、连城等重要产纸区;明清以来全国著名的产纸名区——铅山县,则属于方志敏、邵式平等入创立的赣东北苏区的辐射区域。近代中国纸业与苏维埃革命在地域上的这种高度重合,对于纸业兴衰和革命运动产生何种关联性的影响,学界迄无专文论及。本文以中央苏区所在地——赣闽两省为考察对象,试图从革命对纸业的影响、纸业从业者参与或卷入革命的情况,以及纸在革命传播中的基础作用等三个方面,勾勒革命与纸业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主要方面。

一、革命对纸业的影响

清末以来,机制纸替代手工纸渐成历史趋势,然而赣闽两省的纸业并未迅速走向衰落。据北洋政府时期农商部调查,“全国产纸价值,约四千万元,江西一省约占五分之一;江西全省八十余县中,产纸者占半数以上”。^[2]九江是赣纸外销的北运通道,从其清末民初的输出数量也可看出,除了1895年、1900年等少数年份,赣纸出口数量大致维持在10—15万担之间,1922年更以18.3万担的数量达到最高值。^{[3] (p245-2496)}清末五口通商后,福建拥有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纸张销路大开,外省行客来闽设庄采购,销往东北与南洋的海纸增长甚快”。^[4]1922年至1929年,以汀江流域的纸产区为龙头,福建纸业步入鼎盛时期,“在此八年中,平均每年产值达一千三百万元之数,此种数目,在过去诚属绝无仅有”。^{[5] (p6-8)}这种快速发展,显然得益于外部市场的拓展。以产纸量冠于全省的长汀县为例,“纸之销路,前清时仅及国内各处,民国以来,渐扩大至南洋各地”。^[6]

1920年代中期之后,在日本纸的强力竞争及日本的军事入侵下,赣闽纸业发展面临深重危机。江西纸业“近数年来,受新式机械廉价纸之蹂躏,不但省外市场不保,即本省所用之纸,亦多为洋纸所代替”。^[2]由于日本商务以华北为中心,“故华北市场之纸业为其垄断。江西纸之销路亦以华北为主,受此挫创,影响颇大”。^[7]福建土纸“向以东三省为主要销场,乃自十九年东北被占后,此主要之销路断绝,同时洋纸复向各地倾销,土纸大受打击,故销路日蹙,纸商以成品积滞,多不敢向槽户放款,因此槽户无力起槽,纷纷停造”。^{[5] (p9)}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初起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原与赣闽产纸区域无涉,但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后,中国共产党难以在城市立足,转向南方各省的偏远地区寻求庇护和发展,其活动范围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与赣闽等省的产纸区域产生重叠。在革命由城市向乡村传播的过程中,苏区革命和国共内战由于交通阻隔、金融紧缩以及威胁生命等因素,对纸业的生产与销售产生冲击。

发表于1935年的《调查江西纸业报告书》指出,“产纸区域,多在崇山峻岭之间,曾被共匪盘据,纸民多不能安其业,流离失所,而纸之产量因之锐减”。^[2]万安县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江西省最早发生暴动的地方,该县棉津区在1927年以前有槽户数600家,1932年以后槽户数只有98家;里仁坑在1927年以前有400多槽户,经历苏区革命之后“槽户不上五十家,出纸不到二千担,销路仅及南昌”。^[8]铅山县石塘镇为明清以来全国著名的造纸业市镇,“近年来因共匪关系,已完全停业矣。”^[2]1930—1931年苏区革命在江西的扩散达到高潮之际,“南昌以各产区次第沦陷为匪穴,货品来源断绝,致使纸价一度暴涨至原来价格一倍以上。火纸即烧纸,亦名钱纸,过去销路很为可观,近数年来,一则以迷信之观念,渐渐减除,一则以本省匪患纷纷,农村趋于破产,人民逃散,致使生产与销量,均呈锐减之状”。^[9]赣纸经九江关输出的数量,1930年尚维持在15万7千余担,但至1931年急降至8万8千余担。^{[3] (p246)}

福建纸业受到苏区革命影响的剧烈程度不亚于江西。1929年“朱毛”红军攻入闽西长汀等县,福建全境震动。由于农村社会均呈纷乱状态,“造纸者或罹其害,而失散流离,或竹山被焚,失其原料之来源,此就槽户而言也。至若工人方面,有避乱他方者,有被迫为匪者,此种情形,尤以闽西、闽北等产纸重

要之区为甚,故纸业亦随之崩溃也。”^{[5] (p8)} 1929年后,福建各产纸区的纸业产值均呈衰减现象,其中“以汀江流域产值减退为最甚,较之前期几少百七十万元。其次则为闽江流域,较上期亦差百三十万元有奇”。^{[5] (p9)}

瑞金、长汀是赣闽苏区的两个核心地区。瑞金县在1926—1930年间每年产纸数量达2万余担,但30年代战乱中“纸厂概归停闭”,至1939年纸产才恢复到1万余担;长汀县清末年均产纸约6000吨左右,1921年后十年间降为4000吨以下,1930—1940年因受战争的影响,跌至1700吨左右。^[10] 苏区革命对江西纸业产生直接影响的一项佐证是,原属安徽的婺源县,“去年(1931年)以来,因赣属制纸区域纸槽因匪患停闭,本邑各纸店向之销售赣纸者,今均改办本产纸张,销场骤增,大有供不应求之势”。^[11] 湖南纸业也乘机占领市场,由于“年来湖南除湘西一带外,大部未经匪扰,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如湘乡、宝庆等处,纸业振兴,运来汉口安庆等处,致万安纸业,减少销路。”^[8]

中共文件中亦有赣闽纸业受到革命战争影响的记载。例如,“江西苏区经过几年的残酷斗争,经济生产的破坏是很大的,江西苏区几个主要生产,如石城、瑞金的纸业……因为资本家老板的逃跑及军事行动的关系,有的是破坏了,有的是停顿了”。^{[12] (p468)} 中共瑞金县委在工作报告中也提及“在敌人经济封锁许多出品无法运出,因此这些大大的出产,已比以前大大地减少了,特别纸和烟叶。”^[13] 1930年,闽西各县的纸产量下降明显。其中,龙岩县减少60%,旧年积存40%;上杭县减少50%,旧年积存10%;永定县减少50%,积存30%;长汀县减少80%,积存30%。^{[12] (p299)}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在赣南、闽西等核心区域的统治较为稳固。出于扩大财政来源和安置失业工人等目的,苏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这些区域的纸业恢复与发展,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重要产业。合作社是苏区政府在恢复纸业生产的过程中较为普遍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政府一位基层官员在分析苏区应对经济封锁“似已收相当之效果”时,就提及“福建省工联组织造船合作社,与大规模之纸业生产合作社”。^[14] 1932年冬,汀州市纸业合作社和纸行老板集股成立了中华纸业公司,“共有资金20万元,公司每年春天将生产资金发放给纸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转贷款给纸农或槽户,并与他们订购土纸。夏季后就可以大量收购土纸。公司把购来的土纸,一部份卖给各印刷厂,刊印各类书刊、报刊、杂志。其余通过突破国民党封锁线外运到广东潮汕一带销售。”^[15] 1932年闽赣纸业工会为了促进“运纸出口”,专门发出通知要求下属工会“督促纸行老板经常设法运纸出口来流通苏区经济”,“利用老板去打通各个路线……吸引白区商人来营业和接洽或在边界收买,互订营业条约”。^[16] 闽西工农银行还对“造纸业发放了贷款,增加了纸张生产”。^[17]

由此,赣闽两省苏区的纸业又呈复苏景象。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说“闽西最大的工业——纸业生产,自被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后,差不多完全停槽,自八月来经过纸工的坚决斗争,与党、政府及工会的领导,已恢复九十余槽,纸价已提高一倍”。^{[12] (p510)} 瑞金、宁都、会昌以及赣东北根据地、闽北崇安县等地,也纷纷建立了纸槽、纸厂或纸业生产合作社。^[18] 赣东北苏区“除了原有的铅山河口、弋阳丁山造纸厂外,还在上饶茗洋关、德兴重溪等地兴建了一些造纸厂,开头只能生产草纸和毛边纸,后来改进了造纸技术,能生产尚光纸(印刷苏区钞票用)、京方纸,不但解决了根据地的用纸,而且每年有三千吨至五千吨纸出口”。^[19] 1934年底,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长汀复归国民党政府管辖,设于长汀的纸业公司资产被没收,尽管“造纸公司之详细帐目,均已遗失,各槽纸款若干,无据可查,但各槽尚存有支摺,暂以为凭。出纸区域,兼及江西省境……共十二区二百三十八槽。各区以长宁纸槽最多,有二十四槽,年产九千余担”,总计公司原有资金约十余万元,纸产二万余担。^[20]

二、纸业工人与边区革命

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学生、工人和店员等,是共产主义革命从城市向乡村传播的常见媒介。相比之下,僻处山间的“槽户”、“纸户”或“纸民”,缺乏革命讯息的来源和刺激,因而居于革命传播的末梢位置。即使与山区另一社会群体——采矿工人相比,人员分散、数量偏少且又颇多兼业现象的“纸

民”的集体抗争行为也较为少见。在赣闽两省的近代史上,专由“纸民”组织的暴动较为罕见。1914年,江西造纸重镇沿山县爆发过一次,在该县和尚坪“当地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不堪地主兼槽主的剥削、压迫,自发地举行了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六七百人,拥立一个十多岁的儿童作‘黄帝’,以为号召”,并曾攻破县城,致使富户纷纷逃亡。^[21]

中国共产党对于具体从事制纸工作的工人,一般称为“纸业工人”、“造纸工人”或简称“纸工”,对普通的“槽户”或“纸户”则有时称作“纸农”。广义地说,与纸业有关的从业人员还应该包括挑纸工人。1924年国共正式合作后,尤其是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地方党部、农民协会、各类学校等组织掩护以及党员自身的关系网络,向赣闽等省的地方社会进行渗透。虽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件报告中,屡屡言及手工业衰落、工人失业等社会现状,但包括纸业在内的手工业并非革命传播的重点领域。在“产业工人”这一意识形态观念的主导下,中共在江西发展党员和推动革命形势所选择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安源煤矿、景德镇、乐平鸣山煤矿等地的产业工人。相对而言,规模偏小、较为分散、僻处乡间的纸业工人难以引起重视。在福建,“工人比较多的地方只有:厦门、福州和漳州”,因此中共组织的工人运动也以这三个城市为重点。^{[22] (p32)}较为例外的一次是在苏维埃革命后期——1932年,福建省工联第一次执委会在关于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中,决定其主要的中心工作“是木船工人、纸业工人、雇农苦力,并注意汀州工作和闽北的中心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是与中央苏区有关系”。^[23]

尽管在政策上普遍未受重视,但当中共传播革命的空间延展至赣闽等省腹地后,中共与纸业工人面对面的相遇实已不可避免。一些活动于山城或乡村的中共党员,在产纸区域开展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注意到纸业工人也是组织发展和革命传播的对象之一。在福建长汀县郊区秘密恢复农会的中共党员发现“四都地区又有许多纸坊,纸槽工人多数是贫苦农民兼做纸工的,受高利贷盘剥很重,生活很苦,群众运动比较迅速开展起来。”^[24]与长汀县的古城、四都接壤的江西瑞金县安治乡,诞生了瑞金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邓希平、谢仁鹤、刘忠恩等,他们的革命活动也与纸业有一定关系。1928年中共闽西特派蓝夏桥赴瑞金酝酿革命,蓝首先在古城找到卖纸的邱作顺,再通过邱与邓希平等人取得联系,后来他们不仅在长汀古城成功发动一次纸业工人罢工,还组织了汀(长汀)、瑞(金)纸业工人总罢工,这两次罢工均可视为1930年“安治暴动”的前期基础。^[25]无怪乎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述及瑞金革命活动时,即有“诱惑做纸工人”的语句。^[26]

长汀——瑞金商道是闽赣边界地区人口与货物流动的重要通道,透过蓝夏桥、邓希平、刘忠恩等人的活动范围,我们可以看出,这条商道其实也是革命在长汀、瑞金等县相互传导的交通纽带。在武夷山脉的另一侧——闽北、赣东北地区,山区既有的交通孔道以及纸业工人的社会联系和跨区流动,同样促进了革命在闽赣边界地区的交叉传播。1929年,中共福建崇安县委派张瑞兴到上饶禹溪乡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民众会,“脚庵纸槽工人姚荣章(九进坑人)来禹溪找张瑞兴取得革命联系后,张瑞兴就到脚庵纸槽进行革命宣传。不久就组织起民众会,吸收了七、八十个做纸工人参加。”^{[27] (p202)}与崇安毗邻的赣东北地区,正是中共在江西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方邵”(方志敏、邵式平)革命势力的根据地。这一地区的铅山县石垅、车坑、车盘、乌石等地之所以较早就建立了党支部,就是“因为这一带造纸工人和崇安坑口、黄连坑等地的造纸工人,经常有联系。”^[28]

“方邵”在创建苏区的过程中,曾经利用纸业工人组织革命活动,扩大革命区域。1927年底,由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暴动的参加者朱辉,即系做纸工人出身,他回忆当时“同纸厂的工友一道被编进工人赤卫队”,1928年后“被分配到闽北和信江南部山区,在分水关、车盘、紫溪等地组织发动做茶工人和做纸工人起来斗争”,并称“1929年,工人武装力量在赣东北和闽北各地迅速发展起来。”^{[27] (p145-146)}1929年11月,在上饶县三区双溪、下畈等地,“纸业工人赖玉轩、方海堂等20余人积极要求暴动。”^{[27] (p314)}同年,中共信江特派吴先明赴赣闽边界的资溪、黎川、南城等县开展革命活动,吴“以茶山为中心,首先在造纸工人中发展党员,成立了茶山党支部”,并开展了茶山纸厂工人的罢工斗争;1930年方志纯等人赴资溪县南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不久就发展了造纸工人周天赦、胥长禄等7人为党员,于1930年11月,

建立了南山党支部”并针对姚坊纸行老板发动了一次暴动。^[29]

纸业工人参加红军的现象,在闽北崇安县、闽西宁化县有确切记载。崇安党组织的一份报告说:“在崇安的工人很少,只有纸厂工人、茶厂工人、船厂工人比较更多。纸厂工人多是江西抚州人,他的斗争情绪很高,向厂主进攻也很激烈,在过去他也会另结团体,常有增加工资的罢工行动;现在已经组织了好几个工会(共五百余人),因纸(厂)倒工人失业的原故(纸价低落)许多工友都来参加红军,不复有工会的名义存在;他们斗争情绪很激烈。”^[30]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邱泮林在巡视闽北后的报告中也提到崇安“西乡百多的纸工都参加红军”,并载有与前述崇安报告所记述的江西抚州纸工参加红军的相同内容。^{[22] (p219、238)}1930年,以数百名船工、纸工为基础,中共在崇安还成立了闽北红军教导团。^[31]现宁化县的治平乡,时为汀东县长宁区,“盛产毛边、玉扣纸,有纸槽300多处,造纸工人较多”,1932年长宁区纸业工会成立时共有会员390余人,正是在纸业工会的基础上,苏区唯一一支以纸业工人为主体的游击队——“闽光纸业工人游击队”于1933年得以成立,并从“最初的80余人发展到486人,以后编入红军。”^[32]据老年人回忆,长宁区全区参军的纸业工人“有二百余人”,超过了“农民百余人”的数量。^[33]

尽管近代以来赣闽纸业兴衰不定,苏区革命也曾对其造成冲击,但从赣闽两省的革命史资料记载来看,纸业工人参加红军的现象并未在苏区革命所覆盖的产纸区域普遍出现。除了兼业、迁徙以及革命者对传播对象的选择等因素,苏区纸业生产在相当程度上的迅速恢复,应该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区纸业的发展,可能有效地缓解了纸业工人的失业危机,吸引了其中的大批人以生产建设的方式对苏区革命产生积极作用。由纸业工人组成的、于1933年成立的中国纸业工人工会,是苏区四大工会之一,该工会“直辖福建省、闽赣省纸业工人工会,中央造纸业职工会,以及部分县、区纸业基层工会。”^[34]

三、纸:革命传播的基础媒介

革命需要大量纸张,这是以宣传著称的中共在其发展史上的显著现象。早在北伐时期,中共在南方各省扩大影响后,随着刊物发行量的上升,对纸张的需求就在不断扩大。中共中央早期设立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北伐前《向导》发行数只有一千多,《新青年》、《前锋》不仅销数少,甚至常常不能按期出版,但“到了1925年秋,上店的营业日增,南方各省对于上店的出版物的要求也日切,因为革命形势日渐好转,读者的范围大大的扩充了”,这种状况促使中共决定开办自己的印刷所,还在广州、南昌等地增设了书店。^[35]

苏区革命时期,由于口语传播容易受到恐怖环境、各地方言以及空间阻隔等现实状况的限制,以纸为媒介的书写传播在宣传动员中的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中共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就曾指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鼓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36]随着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巩固,加之苏区纸业的充足供应,中共利用刊物宣传的革命政治模式几乎不受限制地在苏区范围内扩展。苏区“有规模的出版是从1930年开始的,1932—1934三年是出版活动最盛的三年”,“1933年达到顶峰,全年出版总数高达199种”。^{[37] (p32)}当时的苏区,不仅中央及省级的党政机关和红军纷纷编印报刊,各县也办有很多报刊,此外尚有大批书籍、小册子以及难以计数的传单等等。叶再生编制的《苏维埃区出版物通览》,是迄今对苏区新闻出版情况收集资料最为丰富详尽的,共辑录有书籍、小册子695种,报刊291种,合计986种。^{[37] (p31)}另据傅柒生等编著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苏区报刊总量达到300余种,中央苏区各类报刊达到200多种。^[38]其中,影响最大的四种报刊的发行量,按照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39]

与纸质媒介在苏区广泛传播相适应的是,为了使苏区民众能够理解纸质媒介上的文化符号,中共迫切需要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兴办学校和发展教育即承担着这项功能,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纸张的生产、

印刷和传播。中央苏区的四大印刷机构——中央政府印刷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厂、中央财政部印刷厂以及毛铭新印刷所(后扩充为闽西列宁书局),共承印“红军和地方各类学校课本、临时的教材、各类青年、儿童读物等几十万册。”^[40]

这些报刊、书籍与小册子,绝大多数是用苏区出产的毛边纸印刷。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人员任质斌回忆,《红色中华》报“由中央印刷厂印刷,用的纸张是苏区自己生产的毛边纸。”^[41](p14)曾在江西瑞金的中央印刷厂工作过的马永年也忆及,中央苏区的两份名刊——《红色中华》和《斗争》“纸张用的是土制毛边纸”。^[42]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时,成立了《瑞金红旗》报社,“步权乡山坑乡的纸槽闻讯,立即送来了几担优质毛边纸。”^[43]《长汀纸史》详细记述了长汀玉扣纸、毛边纸等纸品在苏区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情况。例如,“1929年红四军首次入闽,利用长汀较好的印刷条件,用大量的毛边纸刊印了《红四军布告》、《中共六大文件》、《十大纲领》、《告民众书》和《告商人、知识分子书》等文告和传单”,“还刊印了《国家与革命》、《社会进化简史》、《共产主义浅说》和《纪念我们的马克思》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当时红四军和苏区各学校的重要教材。另外,共青团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周刊,也用长汀玉扣纸印刷”,毛泽东调查农村社会的著名文献《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也是“用长汀毛边纸油印1000多份,发给每个代表。”^[44]在这种繁密的文化宣传活动中,“中央政府和中央印刷厂等机关每月需纸五千元”。^[45]

昔日印制儒家文化典籍的纸张,在苏区革命时代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等外籍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的基础媒介,并被大量用以传递革命讯息以及正在孕育中的关于革命的正统知识。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不仅包括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组织,而且包括那些擅长写作的革命领袖,例如具有苏俄文化背景的瞿秋白,以本土革命经验见长的毛泽东等。纸张,也是远在苏俄的共产国际和位居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僻处边远地带、且又分隔多处的苏区进行指导与控制的内部传播媒介。在电子信息尚不发达的时代,以纸张为媒介的权力控制方式,成为注重意识形态表达和灌输的中共上层组织颇为有效的远距离控制工具,凸显着意识形态在革命权力体系中的政治整合功能。“翻印”作为苏区文件传递中经常出现、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印刷形式,就恰当地体现了这种权力关系。纸张的大量使用,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对社会更加彻底的干预与改造。在印刷机器的配合下,纸张将中共致力于全面改造社会的政治雄心,呈现为连篇累牍的书面文字,持续向社会传递着革命的信念和讯息。从管理物质供应和社会关系的各种票证,到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的肖像,以及广泛发行的纸币,这些通常盖有权力戳记的纸张,正是革命政权全面渗进社会生活的历史见证,它们共同记录了革命超出暴力之外的社会想象空间。

中共对纸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革命区别于传统反叛活动、也区别于单纯军事暴动的一种表现。纸既是译介革命经典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媒介,也是中共通过社会舆论汲取政治忠诚和建构社会实体的工具。如果说古代王朝是依靠纸张与印刷的珍稀性以及内容甚少变动的儒家典籍,借以达到知识垄断的统治效果;那么中共则是通过大批量的纸张印刷、大面积的讯息投放以及意识形态的日常化阐释,以此塑造革命的正当性与话语权。从这种意义上说,纸在苏区不仅是一种经济物资,更是一种政治物资,其媒介功能是赣闽等省盛产的钨矿、茶叶、夏布、木材等经济物资所不具备的。

参考文献:

- [1]王诗文.中国传统手工纸事典[M].台北: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2001.
- [2]史德宽.调查江西纸业报告书[J].经济旬刊,1935(5-6).
- [3]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 [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二轻工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 [5]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福建之纸业(上册)[Z].1938.
- [6]林景亮.福建长汀纸业调查[J].中国建设,1936(5).
- [7]王峥嵘,钱子宁.江西纸业之调查[J].工业中心,1934(9).
- [8]成仲.江西万安纸业调查[J].经济旬刊,1935(10).

- [9] 哲之. 江西之手工制纸业[J]. 工商半月刊, 1934 (17).
- [10] 温锐. 游海华. 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1] 皖省婺源纸业调查[J]. 中行月刊, 1931 (4).
- [12] 江西省档案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13] 中央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馆.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Z]. 1992.
- [14] 新丰特别区政治局长刘千俊报告匪区民众根本动摇情形匪方维持残局原因及所拟对策报请察核. 军政旬刊[J]. 1933 (7).
- [15]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长汀人民革命史[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 [16]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编写组.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资料摘编(五)[M]. 1978.
- [17] 曹菊如. 曹菊如文稿[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3.
- [18]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编写组.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资料摘编(四)(M), 1978.
- [19] 陈群哲. 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建设述评[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 (2).
- [20] 长汀造纸概况[J]. 申报, 1935-2-8.
- [21] 郑维雄. 铅山县志[M]. 海口: 南海出版社, 1990.
- [22] 中共福建省建阳地委党史办, 福建省建阳地区档案馆. 闽北党史文献(第一集)[Z]. 1983.
- [23] 中央档案馆, 福建省档案馆.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4)[Z]. 1985.
- [24]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汀江红旗: 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Z]. 1983.
-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Z].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 [26]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Z].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 [27] 中共上饶县委党史办, 上饶县老区建设办公室. 中共上饶县党史资料[Z]. 1992.
- [28] 本书编写组.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29] 政协资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资溪县文史资料(第一辑)[Z]. 1988.
- [30] 中央档案馆, 福建省档案馆.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1)[Z]. 1985.
- [3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 [32] 宁化县总工会. 《宁化县工会志》编写组. 宁化县工会志(二稿)[Z]. 福建工运史研究, 1987.
- [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 宁化文史资料(第五辑)[Z]. 1984.
- [34] 本书编纂委员会. 江西省工会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
- [35] 宋原放.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 第一卷上册[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3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一九二八)[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37] 叶再生. 出版史研究(第三辑)[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 [38] 傅柒生. 红色记忆: 中央苏区报刊图史[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1.
- [39] 江西省档案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40]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 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41]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新华社回忆录[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 [42]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 印刷职工运动资料(第三辑)[Z]. 1986.
- [43] 严帆. 邓小平在瑞金的故事[EB/OL]. <http://rjs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95>.
- [44] 黄马金. 长汀纸史[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2.
- [45] 南薰. 以无产阶级坚强领导开展广泛的合作运动[J]. 红色中华, 1933-10-15.

(拙稿修改过程中, 承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何友良研究员和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游海华教授指教, 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吴 贇)